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自2023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重要特征、基本内涵、核心标志及其实践要求、方法论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论述。比如,《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要深刻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并在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具体表现出来。马克思概括了劳动过程中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要素归结起来,就是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并结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

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凝聚了我们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这一优化组合的质变过程,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的科学论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新质生产力理论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

准确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测算

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如何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测度、可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标。比如,劳动生产率就是经济学家们常用的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但这种主要测算单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由于没有考虑到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常常无法全面衡量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更全面地度量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全面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应运而生。1942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提出这一概念。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将总产出表征为资本、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与“索洛余值”共同作用的结构,并在数量上建立了关于产出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核算方法,将其称为“索洛余值法”。关于生产率的具体测度方法比较多,但目前

最为接受和可操作的衡量指标主要是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任何影响经济增长且不可观测的因素都可归于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处理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备受争议,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误区。例如,有的人混淆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技术进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简单等同于技术进步,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以外的其他因素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外,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数据来源不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较远。因此,需要理性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通过实证方法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要正确解读。

尽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存在各种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宏观经济领域中研究竞争水平、经济增长与收入等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实际产出增长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差值,反映了各国家(地区)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包含技术进步在内的各种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变动往往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量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为“汗水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质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为“智慧型增长”。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管理方法、资源配置方式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测算中。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经济持续发展,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实现提升,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严峻挑战。比如,美国、德国等较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日本、韩国等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通过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阿根廷等,正是

由于未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一般来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吸纳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又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明显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有效激发并充分释放了各类要素的活力,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大量涌入,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深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技术进步不足、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投资效率有所降低以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带来的人口红利减弱等问题,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步放缓。

2012年后,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出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幅提升技术进步速率,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提高供给质量、破除市场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仍存在难点和堵点,制约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催生的,这决定了其“新”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上,也决定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产业,只要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经历启示我们,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转向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着力点,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必须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关键。一方面,要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破除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科技创新主要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未来产业主要是由重大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并进而推动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产业,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必须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同时,及时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新型生产关系是在新质生产力牵引下创新形成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支持、市场有效驱动、社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科技创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消除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协同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据《人民日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全球目光再度投向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主题时,中国大地上已悄然书写着清洁能源的新篇章。据报道,今年一季度,我国“风光”发电合计装机达到14.8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14.51亿千瓦)。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不仅彰显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跃迁,更凸显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领跑优势。

近代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文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和艰巨任务也决定了中国必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作出部署。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能源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相关数据显示,今年4月,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能源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8.9%和43.1%。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有效支撑了美丽中国建设。通过建设光伏领跑者基地和开发新能源大基地等举措,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加快改革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与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服务等新兴生态产业同步,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催生形成绿色生产力,上“云”赋“智”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为新质生产力提速,正在加速重构全球能源版图、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我国着眼国内经济转型与全球产业变革的双重逻辑,积极融入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积极

作用。据统计,2023年,中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总额突破万亿元大关,高达1.06万亿元。2024年,中国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71.9%;光伏产品连续4年出口超过2000亿元;锂电池出口39.1亿个。中国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与世界各国积极拓展绿色能源领域合作,将绿色打造为国际经贸合作的底色,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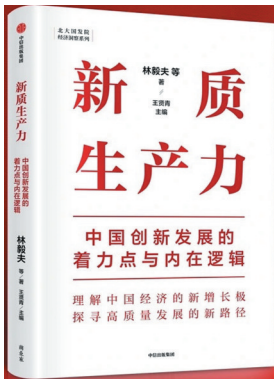
当前,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向“绿”而行,点“绿”成“金”,高新低碳产业活力迸发。例如,河北省张家口市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建设,江苏省盐城市以企业“智改数转赋绿”为抓手推动绿色智能制造,重庆市高新区构建“科、产、城”融合的数绿双化协同生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智慧能源等产业发展……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形成智治创新的绿色化生产方式,激发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动能。

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要求以“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方向指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例如,北京市强化优质绿色金融服务,建立健全气候韧性和生态环保产业体系,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培育、绿色宜居城市建设、绿色文化涵养、绿色合作共建共享五大标杆引领工程,全面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广东省基于算力、数据、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同时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时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为实现绿色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还要求逐“绿”而行、向“新”发力,打造生态文化和绿色生活方式的软环境,为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内驱性增添文化动力。当前,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合力有效形成,助力经济发展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为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持续贡献群众力量。

(据《光明日报》)

我们来读书



论点摘编

谢富胜、李新雨在《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4期撰文指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本动力在于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的首要前提在于为生产经营提供一般物质条件。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产业投资的第一类固定资本与空间生产的第二类固定资本必须相互适应,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有以促进农业及相关工业等多种产业资本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把握其理论内涵与实践外延?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有哪些关联?政策及金融服务又该如何支撑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本书深度解读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帮助读者了解何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围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产业新业态。本书收录了林

毅夫、黄奇帆、郑永年、刘世锦、黄益平、姚洋等国内一线学者、专家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结合外部形势及内部特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与内涵,从战略支撑、产业支撑、金融支撑、基础支撑、目标引领等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这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行解读,对经济回升向好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对数字经济、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进行研判,并为如何继续做好创新这篇文章,在稳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转型提出参考意见,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探寻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佚名)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循环为目标,才能实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不同时期乡村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为此,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推进乡村建设,确保两类固定资本相匹配激发内生动力,完善乡村分类规划,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据《光明日报》)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

任保平、司聪在《经济学家》2025年第2期撰文指出,科技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产业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本在于通过二者的深度渗透、耦合与重塑,以“科技—产业—生产力”的创新范式系统性变革提升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前提是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特质,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路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式是促进多样态融合创新,方向是实现工业经济

向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现代化转型。新时代新征程,二者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明晰总体框架,以深度融合的前提、基础、关键、路径、方式、方向这六个维度一体化凝聚创新合力,提升融合质效。为此,应依托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协同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全新路径,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

(据《光明日报》)